



李海燕◎著

倬彼我系

河汾王氏家族的文学与文化

A Great Family: Studies o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of Family Wangs in Hefen Area

中国文史出版社



李海燕◎著

倬彼我系

河汾王氏家族的文学与文化



A Great Family: Studies o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of Family Wangs in Hefen Area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倬彼我系河汾王氏家族的文学与文化 / 李海燕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5034-4412-8

I. ①倬… II. ①李… III. ①家族—研究—山西省
②文学史—研究—山西省 IV. ①K820.9②I209.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63932 号

责任编辑: 李晓薇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mm × 240mm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202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本书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资助（08JC751002）
北京市人才强教计划“中青年骨干人才培养计划”项目资助
(PHR201108058)

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个人项目资助（2011D005002000004）
亦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0CZW023）的阶段性成果

谨以此书纪念我的祖父李效文先生

目 录

CONTENTS

绪 论	1
第一章 王氏家族的成员与著述	14
一、王度 15	
二、王通 18	
三、王凝 35	
四、王绩 38	
五、王福峙 53	
六、王勃 55	
七、王氏家族的其他成员与作品 62	
第二章 开唐人小说之先河	66
一、以统一的中心意象连缀成篇 66	
二、“有意为小说”的寄托之作 68	
三、体现出了丰富的伦理内涵 69	
四、叙述语言的选择 71	
五、人物地位的提升 72	
六、史传笔法的运用 73	
第三章 对诗体发展的贡献	75
一、对五言律诗定型的贡献 75	
二、对七言歌行发展的贡献 84	

第四章 引领辞赋发展方向	91
一、形式的拓展 92	
二、题材的开拓 96	
三、鲜明的抒情特色 100	
第五章 骈文史上的巅峰之作	102
一、发展及背景 102	
二、巅峰之作 105	
第六章 魏晋风度的时代演变	110
一、王绩的“自适”与“会意” 111	
二、王勃的个性张扬 118	
第七章 山水田园的自在旋律	125
一、王绩：山水诗与田园诗的初步融合 126	
二、王勃的山水之音 131	
第八章 王氏家族与“三教”	141
一、王通与“三教可一”论 141	
二、家族文学的包容精神 147	
第九章 王氏家族文学与文化繁荣的原因	163
一、家富图书 164	
二、家学渊源深厚 164	
三、注重编辑、保存和续成家族成员的著述 165	
四、家族成员的聪慧与勤奋 165	
附录1：王氏世系图	167
附录2：家族文集外散逸诗赋	172
参考文献 174	

绪 论

一

“倬彼我系”乃王勃一首诗的题目^①。王勃为本书所要探讨的河汾王氏家族的重要成员。河汾王氏家族,为隋唐之际居住在河汾之地(黄河、汾河流域的交界地带)的以“文中子”王通、其兄王度、其弟王绩以及其孙王勃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王氏家族作家群体。王氏家族居住的具体地理位置为“绛州龙门县”^②,即今天的

① 《倬彼我系》诗前有王勃之兄王勔之序:“倬彼我系,舍弟虢州参军勃所作也,伤迫乎家贫,道未成而受禄,不得如古之君子四十强而仕也。故本其性情,原其事业,因陈先人之际,以议出处,只天爵之艰难也。”其诗曰:“倬彼我系,出自有周。分疆锡社,派别支流。居卫仕宋,臣嬴相刘。乃武乃文,或公或侯。晋历崩圯,衣冠扰弊。粤自太原,播徂江潞。礼丧贤隐,时屯道闭。王室如毁,生人多殒。伊我有器,思逢其主。自东施西,择木开宇。田彼河曲,家乎汾浦。天未厌乱,吾将谁辅。伊我祖德,思济九埏。不常厥所,于兹五迁。欲及时也,夫岂愿焉。其位虽屈,其言则传。爰述帝制,大搜王道。曰天曰人,是祖是考。礼乐咸若,诗书具草。貽厥孙谋,永为家宝。伊余小子,信惭明哲。彼网有条,彼车有辙。思屏人事,克终前烈。于嗟代网,卒余来继。来继伊何,谓余曰仕。我瞻先达,三十方起。夫岂不怀,高山仰止。愿言毓德,啜菽饮水。有鸟反哺,其声嗷嗷。言念旧德,忧心忉忉。今我不养,岁月其滔。龟俯从役,岂敢告劳。从役伊何,薄求卑位。告劳伊何,来参卿事。名存实爽,负信愆义。静言遐思,中心是愧。”

② 新、旧《唐书》王绩传、王勃传皆言王绩、王勃为绛州龙门人。《元和郡县志》卷十四云:龙门县,古耿国。殷王祖乙所都,晋献公灭之,以封赵夙。秦置为皮氏县,汉属河东郡。后魏太武帝改皮氏为龙门县,因龙门山为名。属北乡郡。隋开皇三年废郡以县,属绛州。十六年割属蒲州,武德三年属泰州,贞观十七年废泰州县隶绛州。

山西省河津市^①。

《俶彼我系》大致是一首追念祖德、颂扬家风、自我勉励以及教育子弟的诗歌。在王勃的存世作品中,与其诸多才华横溢的诗篇相比,此诗甚为古朴,为《诗经》式的四言体,事实上也是其仅存的一首四言体诗歌。然而此诗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不在其艺术性,而在于王勃在对自己家族的追述中,所体现出的对于家族的政治文化的高度认同和颂扬,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出自有周”,且曾“居卫仕宋,臣嬴相刘。乃武乃文,或公或侯”的世家大族,乃是渊源深厚的文化世家,其诗中有:“爰述帝制,大搜王道。曰天曰人,是祖是考。礼乐咸若,诗书具草。貽厥孙谋,永为家宝。”而这一世家至隋唐之际,依旧秉承着“礼乐”、“诗书”之文化传统,为隋唐的文化、文学建设贡献颇著,且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故而本书就借用王勃此诗之题作为书题,以彰显王氏家族在文化文学上的丰硕功绩。

(一)关于河汾王氏家族

河汾王氏为太原王氏的一个分支。

太原王氏出自姬姓,为周文王之后。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王氏出自姬姓,周灵王太子晋以直谏废为庶人,其子宗敬为司徒,时人号曰‘王家’,因以为氏。”(《新唐书》卷七十二中)宗敬死后,即葬于晋阳城北,墓地称“司徒冢”。其后太原王氏后裔徙居各地,又形成许多支源于太原王氏的衍派。宗敬之裔孙王翦,为秦国将军。秦统一六国过程中,征燕国,平楚地,下百越,战功十分显赫。秦始皇论功行赏时,王翦与大将蒙恬共执牛耳。王姓与蒙姓同居天下之先。王翦之子王贲亦为秦国将军,曾败楚军,平魏地,征辽东,屡立战功。王贲子王离,字子明。秦二世夺大将蒙恬兵权,任用王离为大将军。巨鹿之战,王离败于项羽而亡。王离有二子,长曰王元,次曰王威。王元为避乱,徙居山东琅琊,是为琅琊王氏之祖。王元四世孙王吉,为东汉时谏议大夫,开创了琅琊王氏显贵的先河。王威仍居晋阳,西汉时任扬州刺史。其后子孙散居各地。至九世孙王霸,又重返故里,定居太原。王霸生于东汉,屡聘不任,隐居读书。王霸有二子,长曰殷,东汉时中山太守,食邑祁县,其后裔称祁县王氏;次曰咸,随父居晋阳,其后裔称晋阳王氏。后来,太

^① 宋宣和二年改龙门县为河津县。参见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嘉庆重修一统志》,中华书局,1986年5月版,第7275页。

原王氏的两个分支即祁县王氏和晋阳王氏,人才辈出,成为三国两晋南北朝以至隋唐时期影响巨大的名门望族。^①

定居祁县的王殷,即为本书王通的十八代祖,杜淹《文中子世家》称为“十八代祖殷,云中太守,家于祁。以《春秋》、《周易》训乡里,为子孙资。”(《中说》卷十附文)^②祁县王氏至文中子九代祖寓,“遭愍怀之难,遂东迁焉。”(同上)此即王绩在《游北山赋序》所说的:“永嘉之际,扈迁江左。”^③至四代祖虬,据《文中子世家》:“始北事魏,太和中,为并州刺史,家河汾,曰晋阳穆公”,并州府治所在今天的太原。据《录关子明事》:“穆公之在江左也,不平袁粲之死,耻食齐粟,故萧氏受禅而穆公北奔,即齐建元元年,魏太和三年也。……太和八年,征为秘书郎,迁给事黄门侍郎。”(《中说》卷十附文)王绩《游北山赋序》称:“穆公衔建元之耻,归于洛阳”。王通曾族彦,据《文中子世家》为同州府君,王绩《游北山赋序》云:“同州悲永安之事,退居河曲”。王通祖父一,据《文中子世家》载,为安康献公,曾任济州刺史。文中子之父王隆称铜川府君,据《文中子世家》:“隋开皇初,以国子博士待诏云龙门。……出为昌乐令,迁猗氏、铜川,所治著称。”此即为本书所研究的河汾王氏家族父祖世系的大概状况。

因此,本书所要探讨的隋唐之际的河汾王氏家族,为太原王氏的一个分支当无疑义。吕才《王无功文集序》云王绩:“太原祁人也。”太原祁王氏属于当时的士族高门,为山东旧族之一,太原王氏是南北朝隋唐的“四姓”或“五姓”之一。《资治通鉴》卷一四〇齐明帝三年春正月条:“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胡注:四姓,卢、崔、郑、王)《唐国史补》:“四姓唯郑氏不离荥阳,有冈头卢、泽底李、土门崔,家为鼎甲。太原王氏,四姓得之为美,故呼之钁镂王家,喻银制而金饰也。”(《唐国史补》卷上)在唐代,太原王姓与山东崔姓、范阳卢姓、赵郡赵姓还有李姓号称“海内五大姓”,王氏家族在太原、在整个唐代的地位可见一斑。

① 以上参见《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② 杜淹《文中子世家》附于王通著,阮逸注《文中子〈中说〉》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之卷十,除特别说明,下文引用王通《中说》及其所附文章皆出此书,只在文中标出。不再做页下注。《文中子〈中说〉》本书简称《中说》。

③ 王绩著,韩理洲校点《王无功文集》(五卷本会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1月版,第1页。除特别说明,下文引用王绩诗文皆出此书,只在文中标出,不再做页下注。

(二)王氏家族的家学渊源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五有“累世经学”条：“古人习一业，则累世相传，数十百年不坠。盖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所谓世业也。工艺且然，况于学士大夫之术也乎。”王氏家族即属于“累世经学”的世家大族。

王通的十八世祖王殷就曾以“《春秋》、《周易》训乡里，为子孙资”。（《文中子世家》）十四世祖王述曾“著《春秋义绝》”，九世祖王寓、八世祖王罕、七世祖王秀都以文学显，六世祖王玄则“以儒术进”，曾“仕宋，历太仆、国子博士”，江左号“王先生”曾著《时变论》（《文中子世家》）。据《中说》卷一《王道篇》^①记载，五世祖江州府君王焕，曾著《五经决录》，曾祖同州府君王彦曾著《政小论》。祖父安康献公王一“深明易理”，著《皇极谠义》。还曾撰写过禹庙的碑文：“子登云中之城，……降而宿于禹庙，观其碑首，曰：‘先君献公之所作也，其文典以达。’”（《中说·王道篇》）王通之父铜川府君王隆，曾承诏著《兴衰要论》，并“传先生之业，教门人千余，隋开皇初，以国子博士待诏云龙门。”^②

在这个文化世家中，世代相传的即是对儒家经典的阐释发挥，以及如何训导子孙为学。尽管家族谱系久远难以确证，但至少从王通六世祖开始就已经是世代为官，且皆通晓经学。吕才《王无功文集序》云王绩祖上：“历宋、魏，迄于周、隋，六代冠冕，皆历国子博士，终于卿牧守宰，国史、家牒详焉。”朱熹在与王绩的隔代唱和《答王无功思故园见乡人问》中赞之曰：“华宗盛文史”，^③王氏家族成员对于自己的家学渊源，也颇为认同和自豪。如王珪^④曾云：“世习礼乐莫若吾族。”（《中说·关朗篇》）可见，王氏为家学渊源深厚的儒学世家。

① 下文引用《中说》，只具篇名，不再标注卷数。

② 杜淹《文中子世家》：安康献公生铜川府君，讳隆，字伯高，文中子之父也。传先生之业，教授门人千余。隋开皇初，以国子博士待诏云龙门。承诏著《兴衰要论》七篇，每奏，帝称善。为昌乐令，迁猗氏、铜川，所治著称，职满退归，遂不仕。

③ 韩理洲校点《王无功文集》（五卷本会校），第129页。

④ 王珪，字叔玠，太原祁人。在《中说》中，王通称其为“叔父”，或是远房。在唐历任谏议大夫、黄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侍中、礼部尚书等。

(三) 本书用“太原王氏”和“龙门王氏”的原因

1. 不用“太原王氏”的原因

古人习惯上以郡望称呼某一家族,虽然此一家族辗转迁徙,已经离开发祥的郡望,却依旧用旧郡望称之。如“琅邪王氏”,即使在东晋“衣冠南渡”之后,也仍以“琅邪王氏”称之。然而,“正像伊需霞对博陵崔氏以及戴维·约翰逊对赵郡李氏的研究所表明的,组成唐代世家大族的家族,不再拥有一个领地广阔(landholdings)、可以叶落归根的共有祖地。”^①本书所研究的王氏家族,虽是太原王氏的一支,但到我们所要探讨的隋唐之际的河汾王氏,至少上溯到王通的九代族王寓,已经离开了太原祁,根据杜淹的《文中子世家》:王通的九代族王寓“仕晋,遭愍、怀之难,遂东迁焉。”吕才《王无功文集序》云王绩:“高祖晋阳穆公自南北归,始家河汾焉。”^②祖父安康献公王一从北周武帝征战有功,得获赐地。^③王绩《游北山赋序》称:“始则晋阳之开国,终乃安康之受田。坟塋寓居,脩焉五叶;桑榆成荫,俄将百年。”可见,至本书所要探讨的作家们生活的时代,王氏家族已在河汾之地生活了将近百年。

尽管以郡望称呼自己的籍贯为古人习惯,且本书所研究的主要作家王绩在其《游北山赋序》中也自称:“余周人也,本家于祁。”然而,主要是为了表述上的方便,本书的王氏家族在文中称为“河汾王氏”,而不称其为“太原王氏”。因太原王氏到了隋唐,除了本书所要探讨的居于河汾的王氏之外,徙居各地的分支已非常多。而本书所主要探讨的作家,只局限于隋唐之际的居住在河汾的以文中子王通、其兄王度、其弟王绩以及其孙王勃等为主要关照对象的作家群体。若粗略的以太原王氏为题,则在表述上会增加一些不必要的混乱,而直接用河汾王氏,则能够非常清晰明了地阐述本书研讨的对象。

① 美包弼德著,刘宁译《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42页。

② 韩理洲校点《王无功文集》(五卷本会校),《王无功文集序》之第1页。

③ 吕才《王无功文集序》云:“君祖安康献公,周建德中,从武帝征邺,为前驱大总管。”征邺胜利,得获赐地。王绩《游北山赋序》云:“安康之受田”,即指获得赐地也。

2. 不用“龙门王氏”的原因

河汾,即黄河与汾河流域交界地带。王氏家族居住的绛州龙门(今山西省河津市)即位于此。史书上,如两《唐书》在说明王绩、王勃等人的籍贯时,基本上都说他们是“绛州龙门”人。在古代诸多记载王氏家族的材料中,在谈到他们的籍贯时,或说他们是太原祁人,或说他们是绛州龙门人,而在谈到他们的文化影响时,则常用“河汾”、“汾阴”等概念。自北魏时期,河汾地区就已兴儒重教,颇具文化传统。《魏书》卷四十二《薛辩传》云:“(薛)谨自郡迁州,威惠兼备,风化大行。时兵荒之后,儒雅道息。谨命立庠,教以诗书,三农之暇,悉令受业,躬巡邑里,新加考试,于是河汾之地,儒道兴焉。”而王氏此一分支自晋阳穆公定居河汾以来,在此地影响甚著。王绩《游北山赋序》自称:“地实儒素,人多高烈”,绝非自高自大的虚妄之词。吕才《王无功文集序》称:“历宋、魏,迄于周、隋,六代冠冕,皆历国子博士,终于卿牧守宰,国史、家谍详焉。”^①而自晋阳穆公北归,至王通辈,在河汾之地,也该算是“五代冠冕”了。并且,儒学传家的王氏家族,对北朝及河汾之地的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除了王通诸父族皆有著述,其父王隆且在此地“传先生之业,教门人千余”,皆在文化上颇有建树外,本书所要探讨的作家之一王通,在隋曾“秀才高第”,继承了经术进身的家族文化传统,并向隋文帝献“太平十二策”,后退居河汾,著述讲学,远近诸贤,慕名前来问学或投为门下弟子千余,一时间,使得河汾文化传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许多贞观名臣,诸如陈叔达、杜淹、房玄龄、魏徵、李靖、薛收等皆为其弟子或曾问学于王通^②,受王通的影响甚深。其所形成的以儒学为主导的大力倡导“王道”的文化思想被称为“河汾道统”。关于王通的著述讲学活动,被后学称为“河汾学风”。《关学编·李二曲传》云二曲布衣,又当王通之年,“远迹咸以夫子推之”,“东西数百里间,耆儒名士,年长一倍者,亦往往纳贽门墙,彬彬河汾之风焉。”可见学者们把河汾作为一区域文化概念,而把

① 韩理洲校点《王无功文集》,吕才《王无功文集序》之第1页。

② 因房玄龄、魏徵等皆为贞观名臣,而王通的事迹《隋书》无传,两《唐书》无补,故而宋代以来,对王通其人、其著作以及其门人等都产生过怀疑。如洪迈《容斋续笔》卷一《文中子门人》:“王氏《中说》所载门人,多正(贞)观时知名卿相,而无一人能振师道者,故议者往往致疑”等,本书以为,王通其人、其著作以及各种史料中所载的门人弟子等,基本是可信的,详见下文。

龙门作为一行政地理概念^①。在这一点上,虽没有人对此做过特别的说明,但仿佛已经达成共识,有一种约定俗成的意味。而本书的研究,自然是一种文化研究,故而用“河汾王氏”这一概念,而不用“龙门王氏”。

除了表述上的方便,和“河汾”一词更具文化韵味外,本书用河汾王氏这一概念,既有使王氏家族不言自明地带上了深深的文化色彩这一初衷外,也暗含着笔者对“河汾道统”的仰慕,对王隆、王通父子在历经魏晋南北朝的“儒道废弛”、“礼崩乐坏”之后的聚徒授学之举的追怀,笔者希望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能够开启心智,渐明为人之道与为学之道。

二

传统的文学研究多注重单个作家的个体研究,而往往忽略对作家群体、家族文学的关照,这与我国以家族为中心的封建宗法制的历史文化状况是很不相称的。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家族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核心,一直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闻一多先生曾指出:“周初是我们历史的成年期,我们的文化也就在那时定型了。当时的社会组织是封建的,而封建的基础是家族,因此我们三千年来的文化,便以家族主义为中心,一切制度,祖先崇拜的信仰,和以孝为核心的道德观念等等,都是从这里产生的。”^②(《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陈寅恪先生也认为:“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③“故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之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故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④可

① 龙门在隋,为绛州管辖下的县级行政单位。

② 闻一多著《闻一多全集》(第三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453页。

③ 陈寅恪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页。

④ 陈寅恪著《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31页。

见,家族作为基本的文化单位,其创造和传承文化的重要性已得到学术大师们的首肯。

一个家族可以一时在政治或经济上处于弱势,但只要在文化上占据优势,这个家族就往往会有重新振兴的机会。因此,文化家族几乎是所有世家大族中生命最长久、最具历史影响力的、最为不朽的家族。即使历经沧海桑田的变幻,使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乌衣巷》)但王谢等所代表的家族所创造的文化,却是无法移植到任何一家的,他们因而倍受后人的仰慕而万古长青。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虽与学术有别,但考察历史上一个个的世家大族,我们不难发现,文学的遗传基因也常在兄弟、父子、祖孙等家族范围内绵延不绝。譬如我们熟悉的三曹、两陆、二谢等。

事实上,对家族内部文化和文学上的同生共长、绵延相继的现象,古人已经注意到。比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指出:“尔其缙绅之林,霞蔚而飙起,王、袁联宗以龙章,颜、谢重叶以凤采,何、范、张、沈之徒,亦不可胜也。盖闻之于世,故略举大较。”但对于家族文学这种现象的关注,并未引起学者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近年来,这种状况已有改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部分学者主要以六朝时期的家族作为关照对象并对陈郡谢氏、河东裴氏、河北崔氏、兰陵萧氏、江东陆氏、琅邪颜氏、琅琊王氏等大家族的文化现象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内容涉及文学、历史、政治、仕宦、婚姻等方面。有些学者已对家族文学进行了一些个案或综合性的研究,或在某一研究领域内涉及到家族文学。就笔者接触到的有刘跃进的《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主要论述了永明文学与江南吴姓、侨姓士族的关系。程章灿的《陈郡阳夏谢氏:六朝文学士族之个案研究》以及《世族与六朝文学》,对家族文学研究多有开拓。萧华荣的《簪缨世家——两晋南朝琅邪王氏传奇》,涉及琅邪王氏家族文学的研究。张天来的《魏晋南北朝家族观念与家族文学》,对吴郡陆氏、陈郡谢氏等家族文学概况进行了分析。李真瑜的《明清吴江沈氏文学世家论考》、丁福林的《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李浩的《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王春元的《两晋南朝琅邪王氏家族文学研究》等,都对某些家族文学现象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分析和探讨,推进了家族文学的研究。

有些文学史等著作,也涉及关于家族文学的现象,比如袁行霈的《中国文学

史》中有：“不少名门望族世代习文，以维持其声誉，因而家族内部对于子弟的文化教育十分重视，并由此而形成了诸多以家族为中心的文学集团。如当时最为显赫的王、谢二家。王氏家族不但权势崇隆，爵位相继，而且七代之中文才相续，难怪被王筠视为家族的荣耀（见《梁书·王筠传》）。至于谢家，那更是‘芝兰玉树’般的、典型的家族文学集团。从《世说新语》、《宋书》及《南史》等书所载大量有关谢家的文学活动中可以看出，谢氏家族有意识地经常组织儿女在一道‘讲论文义’，相助相长，而且也的确培养出不少著名的文学家。如谢混、谢灵运、谢惠连以及后来的谢庄、谢朓等，都曾对文学的发展做出过突出的贡献。”^①

一些海外学人的著作，如日本田仲一成的《中国的宗族与戏剧》、美国艾尔曼（B. A. Elman）的《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包弼德（Peter. K. Bol）的《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等，都涉及关于家族文学、文化的研究内容。

以上研究成果，都对家族文学、文化的研究做出了贡献，对笔者具有启发意义。海德格尔曾经说过：“艺术作品都离不开各自的世界”^②。文学作品的创造当然也离不开它们的生成环境，而在宗法制的社会里，家族无疑是艺术生成和存在的非常重要的“世界”。而作品又“缔造一个世界”。^③那么，作家所缔造的“世界”，与包括家族在内的本真的世界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与区别？二者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无疑，通过家族文学的研究和探讨，我们一定能够解答或者部分地解答这些问题。否则，透过无法穿越的时间的河流，我们在探讨作家“各自的世界”与他们所“缔造的世界”之间的关系时，若仅仅把目光局限于一些作家个体，而不去寻找作家“各自的世界”（家族即是作家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找寻家族内部一个个“世界”之间的关系，是很难对文学的生成、发展等作透彻精辟的研究的。因而通过家族文学的研究，对于探明文学的生成原因、文学的发展轨迹与脉络、文学与社会文化及家族的关系、文学与人性的关系、家族文学与地域的关系等，都将会有新的进展与收获，从而为文学的进一步研究拓展更为广阔的领域。因而从家

①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2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132页。

② （德）海德格尔著《人，诗意的安居——海德格尔语要》，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1页。

③ 同上书，第82页。

族的角度进行文学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而笔者选择隋唐之际的河汾王氏家族进行研究,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的:

其一,从目前家族文学文化研究的分布来看,其“研究生态”需要改善。上述学者,尤其是国内学者的关于家族文学文化的研究,多集中在魏晋南北朝阶段,且明显侧重于一些著名的文化家族,如吴郡陆氏、陈郡谢氏、琅邪王氏等。其他像先秦两汉、唐宋、元明清等则成果甚少。当然,这样的“研究生态”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毕竟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门阀士族最具势力的阶段,世家大族往往延续数代甚至十数代而不衰,且具有明显的文化优势,因而这些倍受关注的家族无疑是他们所处时代最具研究价值和意义的文化家族了。

隋朝实行科举制之后,世家大族的地位有所衰落,但其影响力还是巨大的。虽然,《新唐书》统计出的369位唐代宰相只是98个士族的后裔。唐代世家大族在高级行政官僚中所占的比例要比南北朝时期小,但这个比例仍旧很高,大约占到百分之六十。^①可见,家族在唐朝的政治上依旧具有根深蒂固的力量。

《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引柳芳论氏族说:“氏族者,古史官所记也。……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又说:“郡姓者,以中国士人差第阀阅为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谓之四姓。”《贞观政要》卷七《礼乐》第二九:“贞观六年,太宗谓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曰:‘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可见,家族在唐朝依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倍受重视。

同时,家族不仅在政治生活中显示出巨大的力量,对于文化建设来说,其作用亦不可低估。隋唐的文学文化家族可谓多矣。比如薛道衡、薛收为代表的薛氏家族;上官仪、上官婉儿为代表的上官家族;杜审言、杜甫为代表的杜氏家族;王维、

① 参见美包弼德著,刘宁译《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41页。